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老年人对夫妻间负性事件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

作者：叶婉青，李晓彤，王大华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按照本研究的设计来看，“婚姻满意度”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正性指标，文章题目内容有重复之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为了避免适应性检验和交叉滞后分析中婚姻满意度的重复分析，我们将婚姻满意度从适应性指标中剔除，即沿用以往研究的方法，只将抑郁和焦虑作为情绪适应性指标。

意见 2：以“婚姻满意度”作为适应性的正性指标，将“抑郁和焦虑水平”作为适应性的负性指标，探讨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适应性功能。研究结果却提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两年后的婚姻满意度均无显著预测作用”。研究者所选用的适应性指标是否可靠？目前的研究结果难以说明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适应性功能。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的修改方式见上一条意见的回复。

意见 3：从“2.2 测量工具”可以看出，研究者分别收集了被试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婚姻满意度”、“负性生活事件问卷”等数据，那么，“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数据是在限定了“负性生活事件问卷”情境下收集的呢？还是在一般情况下的使用习惯？本研究目前的设计似乎不能说明这一问题。“负性生活事件问卷”使用的意义未体现。

回应：在研究方法部分，工具的介绍中我们强调了该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是针对夫妻间负性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情况进行填写，而考虑到负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越多，个体采取应对策略的频率也越大，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意见 4：本研究追踪设计的间隔时间为两年，间隔时间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以往关于压力应对的长期追踪研究大多以两年或三年作为间隔（Pargament, Koenig, Tarakeshwar, & Hahn, 2004; Bodenmann, Pihet, & Kayser, 2006; Prati & Pietrantoni, 2009），本研究对此进行了参考，认为间隔 2 年对于变量的预测以及研究的开展都较为合理，因此选择 2 年作为间隔。

意见 5: 本研究在设计上将“抑郁和焦虑水平”作为适应性的负性指标，其依据是什么？

回应: 感谢您指出该问题，原文对此的表述确实较为模糊，我们在文中对此进行了补充：“如前文所述，压力应对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情绪处理过程，因此情绪适应性是压力应对结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Lazarus, 2006; 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以往研究大多采用抑郁和焦虑作为认知性应对策略的情绪适应性指标（Kraaij, Pruyboom, & Garnefski, 2002; Wang et al., 2014; Garnefski & Kraaij, 2006a），本研究也将沿用此方法，进一步考察在夫妻间负性事件情境下老年人认知性应对策略的使用与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关系。”。

意见 6: “2.1 被试”中，“追踪样本和流失样本在自评健康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967, p < 0.01$)，流失组的自评健康得分显著低于未流失组。”流失组的自评健康数据如何得来？是用两年前的数据与追踪组进行比较吗？还是说有对照组？

回应: 该流失分析是针对第一次测量的数据进行的，即将那些在第二次测量中丢失的被试第一期的数据与两次都参加的被试第一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此我们在文中进行了补充说明。

意见 7: “2.2.1 认知功能筛查量表”，缺乏相关量表的文献出处。此外，简易精神状态检测表属于他评量表，相关研究者是否经过专门的培训？是否具备相关资质？

回应: 感谢您的细心审阅，文中补充了对应的参考文献，也对我们的培训加以了说明。本次追踪研究的主试均为长期从事老年心理研究的人员，测试前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具备相关的资质。

意见 8: “2.2 测量工具”中，老年人抑郁情绪量表（0.536、0.557）、认知性倾向调节策略量表（0.531~0.705）内部一致性信度大多较低，影响结果的可靠度。

回应: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取自一个大型的追踪项目，问卷题目较多，因此为了减轻老年人的疲劳感而采用了简版的抑郁量表，且计分方式为“是/否”计分，这些因素可能一定程度降低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唐丹（2010）以中国老年人为被试得到的该量表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为 0.558 到 0.720， α 系数也并不太高，但是由于它是一份较为成熟而且应用广泛的量表，目前大部分国内老年抑郁的相关研究仍沿用此量表。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该量表做进一步的探索和修订，以形成更适合中国老年人的抑郁量表。同样出于减轻作答负担的考虑，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也采用了简版问卷，该问卷中每个维度的题目仅为两道题，这可能降低了 α 系数，我们也对该量表进行了结构效度的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结果是可靠的。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在综述中提出老年人面对压力时更多采作情绪取向而不是问题取向应对，而本文标题及论述中则着重分析与阐述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作者并未厘清二者之间的关

系，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压力应对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原文确实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对此我们进行了修改，重新定义了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基于前文的研究综述，老年人更擅长在压力中采用认知层面的应对，而提出认知性应对的研究者认为认知性应对过程本质上也是调节压力情绪的过程(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因此将测量认知性应对策略的问卷称为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为了避免认知性应对和情绪调节概念的混淆，我们将原文中所有包含情绪调节的概念更改为“认知性应对策略”，并对此在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意见 2：文中对于情绪调节策略只提出了荷兰学者 Garnefski 等人的观点，但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目前有大量的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观点，虽然本文作者运用 Garnefski 等人编写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进行具体研究，但存在对情绪调节策略并未深入整理综述的问题，是否需要纳入其它研究者的观点？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关于该问题的答案见上一条回复，我们原先提到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其实并不是情绪调节理论下展开的，而是在应对理论的背景下提出了区别于行为层面的认知应对。我们在文中对此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重新定义了认知性应对策略，并在应对理论下阐述本研究的变量，如有不当，希望您再次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努力对此进行完善和修改。

意见 3：负性生活事件测量是否需要在考察量的基础上，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强度进行控制？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个长期追踪项目，第一阶段中负性事件的测量是在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框架下展开的，由于事件的回忆较详细，耗费的时间较长，因此并没有要求被试对每个事件的强度进行主观报告。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希望今后可以对测量做进一步的改进，将事件强度纳进来，以更好地对变量进行控制。

意见 4：作者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前期的婚姻满意度可以影响两年后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他责和沉思。他责和沉思均为非适应性策略，对于这一结论作者试图从个体应对与情境应对两方面进行解释，而并未从情绪调节策入手进行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研究结论并未提出适应性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研究的实践价值。

回应：感谢您的细心审阅和宝贵批评意见，关于“作者仅从个体应对与情境应对两方面进行解释，而并未从情绪调节策入手进行解释”的解释见第一、第二条回复。而结果中并未发现适应性策略预测婚姻满意度，这确实出乎我们的预期，因此在讨论部分我们对此进行了阐述，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老年夫妻间婚姻满意度更为稳定，而策略的测量是情境性的，因此出现了婚姻满意度可以预测应对策略，而不是相反的模式。本研究首次在婚姻压力情境下揭示老年人认知性应对策略的使用特点及其与老年人抑郁、焦虑、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意义。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于一审意见中“文中对于情绪调节策略只提出了荷兰学者 Garnefski 等人的观点，但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目前有大量的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观点”中的并未作有效的解释，也就是说还仅限于以 Garnefski 一种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支撑，而并未整合他研究者的相关观点加以充实研究的理论依据，思维过于狭窄。在解释中提出“Garnefski (2001) 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压力应对也是一种情绪调节过程，因此编制了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用以测量认知层面的应对。”将压力应对、情绪调节过程、认知性情绪调节及认知层面的应对几个概念提出但并未作有效的区分，还需进一步整理。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给我们的文章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原文中对这几个概念的定义确实存在许多混淆的地方，在您的建议下，我们阅读了多篇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领域的经典文献，对文章的行文逻辑做了修改，围绕“情绪调节”的概念展开，重新对压力应对、情绪调节和认知性情绪调节做了区分：

“关于情绪调节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概括。Gross (1999) 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并根据情绪调节的时间进程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先行关注策略（例如：注意分配、认知重评等）和反应关注策略（例如：表达抑制）；压力应对领域的研究者 Folkman 和 Lazarus (1990) 则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和压力应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们都是个体调整与外界关系的过程，当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会随之产生焦虑、悲伤或愤怒等情绪，而此时个体的认知评估、应对方式等过程都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因此都可以视为情绪调节的一部分 (Lazarus, 2006)，而在负性事件发生时的这一系列的情绪调节正是个体适应性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Scheibe & Zacher, 2013)；另外，Garnefski、Kraaij 和 Spinhoven (2001) 则提出情绪调节是一个综合了生理、行为、社会 and 认知的多元概念，从情绪调节的方式上看它既包括了机体内部自发的生理调节，也包括了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调节。

尽管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情绪调节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但是可以看到多种理论中都普遍认同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 Gross (1999) 的情绪调节理论中，先行关注策略便包含了认知层面对情境的注意调整和对情境的认知重评；Lazarus (2006) 在应对视角下提出的情绪调节则包括了对环境和个人关系的认知评估，以及评估之后采取的认知层面的应对；而荷兰学者 Garnefski 等人 (2001) 更是结合了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的相关理论，将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从其他成分的情绪调节中分离出来，提出了认知性情绪调节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的概念，它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后通过有意识的、认知的方式对激发情绪的信息进行管理。”

希望此次修改对文章的行文逻辑有所提升，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2：作者提出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基于情感目标老年人会更擅长于在压力中调节内部情绪进行应对”。而后对压力应对与情绪调节策略的解释又为“即压力应对从概念上讲其实是在处理由压力带来的情绪，而个体既可以在认知层面调节压力情绪，也可以通过行为上解决问

题来缓解压力情绪 (Folkman & Lazarus, 1990; Lazarus, 2006; 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试图解释在压力中调节内部情绪进行应对与处理由压力带来的情绪是一致的, 其实并不一致, 还混淆了压力应对和情绪调节策略的概念, 并且又提出了压力情绪这样一个新的名词, 建议作者对压力应对, 情绪调节策略等研究获取更多的研究观点加以整理, 而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工具所涉及的理论作为研究依据加以解释。

回应: 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在阅读了情绪调节相关的文献之后, 对文中几个关键的变量重新进行了梳理, 具体内容见上一条审稿意见的回复。

意见 3: 采用《ENRICH 婚姻质量问卷》(ENRICH; Olson, Fournier, & Druckman, 1983), 婚姻满意度问卷并未报告是否作了本土化的修订, 因为文化的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婚姻满意度维度会有所差异。请补充说明。

回应: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我们在文中增加了该量表中文翻译的文献, 该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较为广泛, 也做了本土化适用性的检验。

意见 4: 负性生活事件的强度是压力产生及强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并决定了个体采取的策略不同, 而压力应对不仅存在情绪应对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 在个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会采取回避策略, 作者需要对这一点作进一步说明, 如果前期资料完整可以进行评定。

回应: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我们理解您提到的回避策略相对于情绪应对和问题解决应对, 更偏向于是行为层面的应对策略。这确实是存在的现象。但是, 行为层面应对策略不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感兴趣的是认知层面进行的情绪调节。我们认为在认知层面可能出现避免直接处理负性事件的策略, 本研究中的 9 种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就已经包含了认知上的回避策略, 比如注意力转移和合理化。

意见 5: “另外, 以往研究普遍发现积极重评可以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 (Kraaij, Pruymboom, & Garnefski, 2002; Garnefski & Kraaij, 2006a), 但是本研究则没有发现此结果。描述统计的结果显示, 本研究中老年人在面对夫妻间负性事件时采用最多的认知性应对策略是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 这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相符, 即老年人在情绪调节上存在积极偏向, 他们更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并倾向于用更积极的角度解释负面情境 (Carstensen, Mikels, & Mather, 2006; Blanchard-Fields, 2007)。我们推测由于积极重评是一种老年人普遍采用的应对策略, 因此并没有体现出其对情绪适应性的显著预测作用, 但该结果仍需要今后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检验和解读。”这部分对结果讨论中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描述统计的结果不能简单的用以解释结果, 二是如果积极重评的一种老年人普遍采用的应对策略, 那么对其情绪适应性从假设上就应该是具有预测作用的, 为何作者的解释正相反呢。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描述统计的结果确实不能作为推论的依据, 我们删除了这部分内容, 只是对现象做了描述:

“以往研究普遍发现积极重评可以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 (Kraaij, Pruymboom, & Garnefski, 2002; Garnefski & Kraaij, 2006a), 本研究却没有发现此结果。从描述统计的结果

看来,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却是老年人在面对夫妻间负性事件时采用最多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但在本研究中它们并没有对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产生影响。在国内其他对老年人的心理研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结果,例如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消极老化态度可以正向预测抑郁和焦虑水平,却没有发现积极老化态度的效应(唐丹等,2014;王大华,燕磊,2011)。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意见 6: 建议作者对认知应对和情绪调节策略作进一步分析,采用哪一个表述更恰当,作者全文更多涉及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而不是应对方式,并且也是从抑郁和焦虑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回应: 再次感谢您对本文的概念和逻辑上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阅读了情绪调节的文献和对行文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将主要的变量的描述改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详见第一条审稿意见的回复,希望现在的概念表述和行文对此问题有更好的解答。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配偶是老年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的来源,因此婚姻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重大。本选题对可能影响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负性事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老年人的认知性应对策略与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为改善老年人的认知,提升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回应: 感谢您的肯定,希望此次的文章修改能够对文章质量有更大的提升。

意见 2: 在文献综述上,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比较充分,理论框架比较完整。研究对关键变量(核心变量)的选择比较清晰,被试的取样契合该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量表是被认可的测验工具,具备信度和效度指标。参考文献丰富,格式正确。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肯定。

意见 3: 对老年人来说,维持到现在的婚姻关系已经非常稳固,互动方式和相处模式已经定型,并且老伴在生活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全中国 22 万样本的数据证明,只要有配偶的老人,日常照料、照护人等排在第一位的大多是配偶,并且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包括独居和仅与配偶同住),配偶是老年人唯一朝夕相伴的人,现实因素和情感因素使得老年人对自己的婚姻非常依赖,在这种不能或缺的心理定势下,任何认知策略均会出现非理性倾向。因此,文章得出“认知性应对策略并不影响两年后的婚姻满意度,而是相反”是非常符合老年人婚姻的实际情况的。认知策略对当时的情绪调节可能更重要,而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如作者预期的重要,建议针对这点进行分析和修改,以突出数据所佐证的部分。

回应: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此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至于为何没有发现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而是相反,笔者认

为这或许体现了老年期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关系稳定。本研究的追踪间隔时间是 2 年，近期发表的一项同样以老年夫妻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尽管 2 年内老年夫妻间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但他们的婚姻满意度仍表现出非常高的稳定性（Margelisch, Schneewind, Violette, & Perrig, 2015）。对老年人来说，维持到现在的婚姻关系已经非常稳固，彼此之间已经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不像年轻人的婚姻关系会轻易受到各样外在环境的干扰（Velotti et al., 2016）。另外，Ridder 和 Kerssens（2003）的研究指出，短时间内个体应对策略的使用并不是一种稳定的风格，而是会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在本研究前后两年的间隔内，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稳定性要高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稳定性，因此难以体现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在跨时间上的预测作用。”

意见 4： 负性事件、认知策略、情绪调节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面对同样的负性事件，采取什么样的认知策略，会有什么样的情绪与个人既往历史事件积累的认知有关，与个体性格特质有关，两个截面数据虽然是追踪，并不足以描绘和断定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可能，建议以相关的访谈资料进行补充。

回应：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目前我们的结果只是一个统计的数据，确实需要一些访谈来进行佐证，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完善。本团队还将继续收集第三次和第四次追踪数据，以期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意见 5： 从文章本身来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正性事件与负性事件一样具有产生压力的作用，只考察负性事件的影响也可，但将正性事件与负性事件的总评分作为压力源，考察老年人的认知策略和应对方式可能更全面地了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另外，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是初婚还是再婚也是婚姻满意度的一个影响因素。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在文中的被试部分补充了样本婚龄的数据，本研究第一次测量时被试的平均婚龄为 46.6 年（ $SD = 8.1$ ），最低婚龄为 21 年，从数据结果看来，我们的被试中婚龄最低的也有 21 年，再婚和初婚在本研究中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我们没有排除再婚的被试。